

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

——析桑德拉·西斯内罗斯的《芒果街的房子》

石平萍

内容提要:《芒果街的房子》是一部美国墨西哥裔女性成长小说。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重点剖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女主人公埃斯佩兰萨的成长历程,指出埃斯佩兰萨是不同于传统的瓜达卢佩圣母型和玛琳齐型的新女性,从而揭示出作家西斯内罗斯对墨西哥裔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反思和颠覆。

关键词: 女性生存 空间 瓜达卢佩圣母 玛琳齐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5)03-0025-05

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娃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从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这句话作了注解:“我们是在墨西哥文化的熏陶中被抚养长大的,这种文化为我们准备了两个行为榜样:玛琳齐(La Malinche)和瓜达卢佩圣母(La Virgen de Guadalupe)。……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要么学这个,要么学那个,没有中间的可能性。”这两类对立的女性原型,恰如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圣母玛利亚和夏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和泼妇淫妇,作为男性中心的话语形式,对一代代形成女性主体的压制,迫使她们成为臣服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主义者的重要使命,便是解构这些按照男性意愿、为确保男性统治地位设计出来的虚假妇女形象,建构反映女性生存真相的反话语,帮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主体性存在。西斯内罗斯的代表作《芒果街的房子》便是此种性质的反话语。这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埃斯佩兰萨·科德罗的墨西哥裔女孩,在她居住的芒果街上,生活着众多的瓜达卢佩圣母型和玛琳齐型女性。她们在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着正面或反面的引路人角色,从她们身上,埃斯佩兰萨领悟到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局限性和虚假性,进而

确立起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开辟出女性生存的新空间。

一、“瓜达卢佩圣母”的异端邪说

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天主教徒信仰的神,相当于基督教的圣母玛丽亚,她抚慰穷人,保护弱者,帮助受压迫者,是母性的象征。在宗教重要性之外,瓜达卢佩圣母还具有政治意义,对墨西哥民族身份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前身被认为是阿兹特克文化中的丰饶和繁衍女神托南齐恩(Tonantzin),因而代表着与西班牙殖民文化相对的墨西哥本土文化;她被尊崇为土著居民的保护神,广泛出现于墨西哥独立革命中的旗帜上。就女性气质而言,她是圣洁的贞女,在墨西哥文化中被标榜为美德的典范、妇女的楷模,教会借助她宣扬童贞至上和禁欲操守,普

西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第23页。

Pilar E. Rodriguez-Aranda, "On the Solitary Fate of Being Mexican, Female, Wicked and Thirty-three: 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Sandra Cisneros," *The Americas Review* 18.1 (1990): p. 65.

关于成长领路人,参见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24—138页。

通大众则从她的纯洁、温顺、慈爱和自我牺牲等品质中获得感情的慰藉。在《芒果街的房子》中,埃斯佩兰萨的母亲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是女儿成长过程中观照的行为榜样。女儿眼里的母亲有着圣母般的美貌和品德,尤其在“头发”这个小故事里,她用颂歌的句式对母亲的描绘不啻是教堂里的圣母像:

但我妈妈的头发,我妈妈的头发,像小巧的玫瑰花结,像卷曲精致的糖果卷儿,因为她整天戴着发卷,当她抱着你的时候,当她抱着你、你感觉非常安全的时候,把你的鼻子伸进她的头发,你会嗅到甜甜的味道,那是烤面包之前暖融融的味道,当她在床上留着她体温的一侧为你挪出地方,你躺在她身边,窗外雨水滴滴答答,爸爸的呼噜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你嗅到的就是这种味道。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滴滴答答的雨,还有妈妈散发着面包香味的头发。(第 6—7 页)

在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父权制家庭里,埃斯佩兰萨的母亲可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用无私的爱心和辛勤的双手,与丈夫一起把清贫的家变成了温馨的港湾。按父权制的逻辑,这是理想女性理想的幸福生活。然而在“聪明的家伙”中,父权制培养的理想女性却反戈一击,将幸福的神话击得粉碎。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并不能让母亲感到满足和快乐,她告诉埃斯佩兰萨:“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你知道吗?”(第 90、91 页)母亲天资聪颖,会说两种语言,会唱歌剧,会画画,可惜很早辍学嫁为人妇之后,她只能“用针和线画画,画小巧的玫瑰花结,还有丝线绣成的郁金香”。(第 90 页)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女性要进行艺术创作,必须先杀死“屋子里的天使”。然而面对强大的父权制传统,谈何容易。埃斯佩兰萨的母亲做了一辈子“屋子里的天使”,连该坐哪趟地铁去市中心都不知道。所幸她并未完全内化男权文化规定的女性价值观,在为家庭无私奉献的同时,她保留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没有放弃对艺术的向往。她更没有成为父权制的同谋和帮凶,教育女儿做圣母型的理想女性。恰恰相反,她不仅现身说法,还用蝴蝶夫人和周围的单身母亲做反面教材,督促女儿努力学习,靠教育改变做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她是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萌芽的母亲。

埃斯佩兰萨的姨妈与瓜达卢佩圣母同名,也是一位圣母型的妇女。身患不治之症的她一直盼着死神的到来,因为病痛使她无法履行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面对“只想做小孩子、不想洗碗、不想给爸爸熨衬衣的孩子,还有想着再娶一个妻子的丈

夫”,她倍感“羞愧”和“不安”。(第 61 页)毋庸置疑,她羸弱的身体承载着温顺、慈爱、自我牺牲等为父权制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但作家刻画这样一位“受难的圣母”,并非为埃斯佩兰萨树立一个女性的楷模,透过埃斯佩兰萨的讲述,读者看到的却是“圣母”光环背后男权文化的丑陋和冷酷。瓜达卢佩圣母被供奉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病中的瓜达卢佩姨妈却如“小小的牡蛎,张开的硬壳里的一小片肉”,窝在不见天日的小屋里,“水槽堆着脏盘子,布满灰尘的天花板上爬着苍蝇”;圣母受到万千信徒的膜拜和称颂,姨妈却无从奢求丈夫的体贴和忠贞。(第 60 页)如此强烈的对比,凸显的恰恰是男权话语支配和规范下,女性生存的非人化。姨妈如同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其价值体现为圣母般的美貌和美德,以此换取丈夫提供的经济保障;但当疾病剥夺了她的价值和相夫教子的能力,她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求生还是求死,全得看丈夫的脸色。

“瓜达卢佩”本是男权文化用以指代理想女性的符号,却与不治之症、生活的停滞和女性的无助联系在一起。作家试图解构这一女性原型的意图不言而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里写道的:“被男人称颂的理想女性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自我愿望,即她们的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解构的目的是为了给女性创造一线生机,作家在铺陈凄凉意象之后,让埃斯佩兰萨听到了受益终身的教诲。瓜达卢佩姨妈虽生不如死,但这种极端的生存状态反倒使她认识到身体乃至心灵的自由对于女性的可贵,她的病榻成了埃斯佩兰萨的书房,她鼓励埃斯佩兰萨“坚持写作。那能带给你自由”。(第 61 页)这与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不谋而合:“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闭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

母亲和姨妈做了一辈子的贤妻良母,却告诫埃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第 91—92 页。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 347 页。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 194 页。

斯佩兰萨要走教育求自立的道路,要借艺术创作获得身心的自由。这是与父权制传统女性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异端邪说,却是她们付出一生的代价换来的血泪教训。男权文化仅仅用为人妻母来界定女性的生命价值,用母性取代女性完整的人性,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生活小圈子,其结果必然是剥夺女性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使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需求而存在的工具。虽然她们这代人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走出“家”的四堵墙,但埃斯佩兰萨最终能摒弃父权制传统对女性的定义,成长为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们的引导功不可没。

二、“玛琳齐”的改邪归正

玛琳齐是墨西哥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传奇女性。据记载,她生于1501年,父亲是一个印第安部落首领,父亲死后,母亲改嫁,把她卖给了过路的商人,几经辗转,最后她成了塔巴斯科玛雅族首领的奴隶,通晓几乎所有的印第安语。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赫尔南多·科特斯抵达阿兹特克人统治的墨西哥,她被当作礼物敬献。不久科特斯发现了她的语言天赋,她得以从女奴转变为翻译和情妇,被称为“玛丽娜夫人”(Donna Marina)。她为科特斯育有一子,并帮助他征服了墨西哥,随后却遭到抛弃,被转嫁给他的下属。本族人视她为叛徒,轻蔑地叫她玛琳齐(意思是“船长的女人”),据传还处死了她与科特斯的儿子以示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出于墨西哥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玛琳齐”成了被西班牙人勾引或强暴,因而背叛民族和国家的印第安女性的代名词,她的背叛和被玷污被视为对墨西哥男性中心文化的威胁:男性的强势地位遭到颠覆,男性的保护无济于事,传统的妇德遭到僭越。在墨西哥人的意识深处,“玛琳齐”指代受歧视的女性:妖女、荡妇、弃妇、被强暴或被奴役的女人。

《芒果街的房子》中,最易辨识的玛琳齐型女性无疑是玛琳(Marin),作家为她安排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名字。不仅如此,她的经历可说是玛琳齐原型的置换变形:她远离波多黎各的父母,孤身一人寄居在美国的姨妈家,靠给姨妈看孩子换得生活费,人身自由受到控制。玛琳最大的梦想就是钓得金龟婿,远远地离开姨妈家,离开芒果街,过上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她看来,唯一的办法便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最好是先在白人占多数

的市中心写字楼里找一份白领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把自己打扮成性感的尤物,吸引有钱男人的目光。即便只是姨妈家的小保姆,玛琳也“总是穿着深色的长统尼龙丝袜,脸上画着浓浓的妆”。(第23页)每晚等姨妈睡觉之后,她穿着短裙,点着香烟,在房前如展览商品一样展览自己,或者深更半夜去参加舞会:“要让男孩子看到我们,也要让我们看到男孩子。”(第27页)在芒果街居民的眼里,玛琳成了一个满身风尘味、不守贞节、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不惜背叛芒果街的坏女孩。姨妈最终打发她回了波多黎各,因为这个危险的妖女“太让人操心了”。(第27页)

莎莉是书中另一个玛琳齐型的女孩。如果说玛琳是为了实现美国梦而主动选择做“玛琳齐”,莎莉却是父权制“红颜祸水”逻辑的受害者。她天生丽质,喜欢打扮,把眼睛画得像埃及艳后,“穿着烟灰色尼龙长袜……黑外套和鞋子”。(第81-82页)在父亲的眼里,“美丽到这个份上是麻烦”,因为他信仰的宗教教规很严,而且他的姊妹曾因私奔而令家人蒙羞。众所周知,天主教提倡禁欲,尤其看重女性的贞操;女性向来被视为是充满诱惑且危险的“夏娃”,教会常常告诫男人要管好自己的妻女,否则她们可能随时投向陌生人的怀抱。美貌的莎莉对男性已经构成相当大的诱惑,她没有刻意收敛,却放任自己的爱美之心,更加突出女性的身体魅惑。在深受天主教影响的芒果街西语裔居民看来,即便莎莉没有做出任何不轨之事,她也是妖女和潜在的荡妇,女同学不愿与她交朋友,男同学都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连埃斯佩兰萨的妈妈都暗示:“这么小就穿黑色是不吉利的。”(第82页)莎莉的父亲也把女儿看成潜在的“玛琳齐”,随时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无论何种情况,对他作为男性家长的权威和尊严都是严重的损害。他不让女儿去学校以外的地方,不让女儿参加舞会,一旦发现女儿与男孩子说话,便会“像打一条狗一样地用双手打她”。(第92页)

父权制社会不由分说,把“玛琳齐”的帽子扣在莎莉头上,对她的期待只有两种:不是变得安分守己,便是继续自甘堕落,而提供给她的出路只有前者。初始,莎莉选择了“阳奉阴违”的抗争:在家里,她是“父亲的女儿”,在家外,她是爱美的莎莉。但是

近些年,墨西哥也有一些作家试图更客观地评价玛琳齐这个历史人物。参见张淑英《生枯起朽的魔幻——论佩德罗·巴拉莫的书写》, <http://ccms.ntu.edu.tw/~luisa/article/pedro-paramo.htm>。

到了“猴园”和“红色小丑”里,莎莉与男孩子交往随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女孩。莎莉的行为不难理解:对她而言,身体是自我的唯一载体,也是反抗父亲、反抗芒果街的唯一武器。她试图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却在“玛琳齐”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招致愈传愈烈的坏名声和父亲变本加厉的毒打。无奈的莎莉只得辍学,嫁给一个糖果推销员。婚姻可以给予她妻子的名分,一劳永逸地帮她摆脱坏女孩的形象和父亲的淫威,进而按“瓜达卢佩圣母”重塑自己的形象,赢得社会的认可。对此,埃斯佩兰萨颇有见地:“她这样做是为了逃离。”(第 101 页)不幸的是,莎莉才出狼窝,又入虎口。丈夫不让她打电话,不让她的朋友上门,甚至不让她“向窗外看”,她整天“坐在家里,因为没有他的许可,她不敢出门。”(第 102 页)像她这样的情况在芒果街上并不少见,拉费拉“美丽得令人无法直视”,丈夫怕她逃跑,一出门便把她锁在家里。(第 79 页)莎莉从“父亲的房子”逃到了“丈夫的房子”,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它们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男人的领地,是父权制价值体系主宰的世界。她——包括她的贞操——只不过是男人锁在房子里的财产,婚前归父亲所有,婚后归丈夫所有。

与被动、温顺、贞洁的圣母型女性相比,玛琳和莎莉都是具有一定自由意志的主动型女性,这是埃斯佩兰萨在她们身上看到的闪光点。然而,玛琳虽有一定的经济自立能力,却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而莎莉在父权制设计的两种女性原型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前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商品,后者除了姿色一无所有;前者等待男人带她“去住在远方的一幢大房子里”,后者永远也不可能如埃斯佩兰萨设想的那样,走到一栋位于芒果街外的房子,自由地呼吸。(第 26 页)埃斯佩兰萨意识到,无论是“玛琳齐”,还是“瓜达卢佩圣母”,归根结底都是男人的附属品,很难成长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莎莉改邪归正,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埃斯佩兰萨“自己的房子”

芒果街上的西语裔妇女,无论是“瓜达卢佩圣母”,还是“玛琳齐”,但凡出现在埃斯佩兰萨敏感的视线里,总是与房子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房子不再代表着舒适的家或安全的空间,更多的时候,它成了父权制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象征,有形或无形地禁锢着女性的身心。

从身边这些女性的遭遇中,埃斯佩兰萨看到了与自己同名的曾祖母的影子。曾祖母本是一个“像野马一样的女人,野到了不想结婚的地步”,却被曾祖父用麻袋扛回了家,如扛“一盏新奇别致的枝形吊灯”,从此,家形同牢狱,“她一辈子望着窗外,像很多很多女人那样用肘撑着忧伤”,仿佛她名字的不祥寓意——“在西班牙语里,……它意味着忧伤,意味着等待”——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应验。(第 10、11 页)从曾祖母生活的墨西哥,到埃斯佩兰萨所处的美国,时空的变迁,并不妨碍同样的命运在一个又一个西语裔女人身上重演,如今的芒果街上,像曾祖母一样“在窗边等待的女人”比比皆是。难道这是女性的宿命:面对父权制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霸权,野马般的女人也难以逃脱?埃斯佩兰萨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解读,她看到的更多是教训,是警示:女人如果一味地温顺、被动、妥协,“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着男人的睾丸和锁链”,结果只能是世代代被囚禁在“男人的房子……爸爸的房子”里。(第 88、108 页)虽然她“继承了(曾祖母的)名字”,却决意不要“继承她在窗边的位置”;不仅如此,她还要“取一个新名字,一个更能代表真实的我、无人知晓的我的名字”,拥有一栋“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一个我可以来去自如的空间”。(第 11、108 页)

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说过:“废弃名称和自我命名的行为是确立文化身份和申张自我的必要手段。”埃斯佩兰萨把这个独立的自我命名为“紫紫 X”,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符号,体现的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埃斯佩兰萨不仅拒绝接受父权制对女性的定义和期待,而且在不经意间,摒弃了男性中心话语的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男性中心话语为了确保父权制的等级秩序和男性的社会地位,定义和确立了两种对立的女性基本类型,如紧箍咒一样套在所有女性的头上,严重地压抑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丰富多彩的、不断变化的生命需求。埃斯佩兰萨拒绝给自我一个明确的、恒定的定义,便是反其道而行之,听任天性的自由发展,激发内心的各种可能性,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获得完整生命体验,这对于成长中的女性是至关重要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可以成功地

在西班牙语里,“埃斯佩兰萨”(Esperanza)的意思是“等待”。

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Oxford: Oxford UP, 1991), p. 7.

把自我从父权制女性价值观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建构独立的主体意识。埃斯佩兰萨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如果说芒果街上的绝大多数女性不是“瓜达卢佩圣母”便是“玛琳齐”,埃斯佩兰萨的女性自我却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自成一体,无法被父权社会贴上简单化的“好”或“坏”的标签。

表面看来,埃斯佩兰萨的自我建构似乎是以“玛琳齐”为镜像,最明显的联系在于两者都没有臣服于西语裔父权制传统文化的禁欲主义要求,刻意压抑性意识,规训自己的身体。埃斯佩兰萨正处在青春发育期,性意识、性别意识的萌动和发展变化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在《芒果街的房子》中,她对生理变化的敏感,她的爱美之心以及对与异性交往、对性爱的渴望成了“小脚之家”、“胯”、“钱恩克拉斯”、“赛尔”等小故事的中心内容。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规约性期待逐渐渗入她的意识,牵制和挤压着她的生命需求,在她的内心造成了不小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却是对自我的忠诚和对自由的渴望。在“赛尔”中,埃斯佩兰萨直言不讳:“我想不守规矩,在夜里坐在外边,有个男孩子搂着我的脖子,风钻入我的裙子底下。”(第73页)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她对莎莉这样的坏女孩产生了真切的同情。即便后来被同事强吻,又遭人强奸,成了事实上的被强暴的“玛琳齐”,她仍然没有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反倒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男性对性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强调女性的贞洁,一方面却对自己的欲望不加控制;无论何种情况,女性都是受害者。自身的经历,加上芒果街其他女人的遭遇,更加坚定了埃斯佩兰萨不做“第二性”的决心。她拒绝做传统的好女人:“我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战争。……我是一个像男人一样离开饭桌、既不往后推凳子也不端走盘子的女孩。”(第89页)而她欣赏的坏女人却不存在于现实生活:“电影里常常有一个嘴唇鲜红鲜红的女人,既美丽又残忍。她是一个让男人发狂却又把他们嘲笑走的女人。她的力量属于自己。她不会让这种力量消失。”(第89页)这样的坏女人有点像“玛琳齐”,但她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和性玩偶,而是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主人。

对埃斯佩兰萨来说,身体不是对付男人的武器,更不是女性最终获得自由的途径。妈妈和姨妈向她指出了教育和写作的出路;艾丽西娅,一个靠教育、自我奋斗改变命运的女孩,给她树立了具体的榜样。埃斯佩兰萨最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子”,不仅是代表富足生活的物理意义上的房子,更是不受芒

果街男性中心价值观控制的“心灵的房子”,是女性生存的新空间。(第64页)埃斯佩兰萨的梦想及其对芒果街的拒斥颇似玛琳齐的投诚求荣,但她的榜样不是倚赖男人拯救的玛琳齐,而是走自救之路的艾丽西娅,而且,她摈弃的只是西语裔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心始终与芒果街上本民族、本阶层的同胞在一起。恰如她所说:“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身份和我成长的地方。路过的流浪者会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会把阁楼让给他们,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无家可归的滋味。”(第86页)更重要的是,埃斯佩兰萨谋求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还有芒果街所有女人和男人的福祉:“我离开,为的是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人。”(第110页)她吸取了“瓜达卢佩圣母”的积极因素:悲天悯人的情怀、普救众生的使命和助人为乐的美德,把小我建构成推己及人的大我。

逐步走向成熟的埃斯佩兰萨身上既有“玛琳齐”的痕迹,也有“瓜达卢佩圣母”的影子,但她既不是“玛琳齐”,也不是“瓜达卢佩圣母”。她将建构一个父权制传统无法界定的女性自我,成为兼具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担任西语裔族群、尤其是妇女的代言人和引路人。她要用手中的笔写自己的故事,激励千千万万的墨西哥裔妇女摆脱身体和心灵的束缚,自立自强,改变愚昧、受剥削和控制的生存状态,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她要用手中的笔写芒果街女人和男人的故事,让白人主流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为改变西语裔的生存状态击鼓呐喊。不妨说,埃斯佩兰萨将沿着她的创造者的道路,成长为一位“奇卡纳女性主义者”。西斯内罗斯曾说:“在我创作的故事和我本人的生活里,我力图表明,美国西语裔妇女必须对我们这个性别进行彻底改造,运用全新的神话重新解释。”就《芒果街的房子》来说,此言不虚。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参见笔者论文《超越二元对立——双性同体与紫色》,载北京外国语学院科研处编《庆祝北京外国语学院建校6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第684-697页。

Myrna Yamil Gonzalez, "Female Voices in Sandra Cisneros'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in *U. S. Latino Literature: A Cri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ed. Harold Augenbraum, etc.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101.